

湖南文史通訊

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总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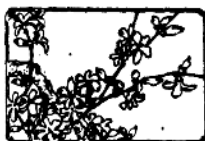
杨第甫同志在湖南省第二次文史资料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穰明德同志在湖南省第二次文史资料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2)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 (22)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总结…………… (37)

湖南省州、市、县政协第一次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纪要…………… (46)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编

责任编辑: 高原 梅欣

地址: 长沙市迎宾路5号

• 内部参考 •

长沙晚报印刷厂印刷

杨第甫同志在湖南省第二次 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我省第二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我代表省政协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刚才，凌敏猷副主席和曹国枢常委分别作了讲话和传达，他们的讲话和传达精神，我完全同意。同志们在基层为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出版、发行，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趁此机会，我代表省政协向到会的同志并通过你们向工作在各地的文史工作人员以及积极为我们提供文史资料的撰稿者表示热烈的慰问和敬意，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首先，我拥护邓颖超同志、杨成武同志在全国政协第四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的讨论稿。特别是邓大姐的讲话，是我们做好文史工作的指南，我建议这次会议认真学习讨论，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作出贯彻执行的方案。

现在，就我省文史资料工作谈几个问题：

一、谈谈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一九五九年周恩来总理倡导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以

来，到今年已是二十四年了。二十四年的实践证明，征集编印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说它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呢？

第一，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独立的、以我为主的工作。政协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几个委员会，有很多工作组。他们在开展工作时，绝大部分工作需要有关部门配合行动，不配合就搞不好。不要说体育、卫生、文教、财经，要各方面配合行动，就是提案审查，也要别人配合搞，我们顶多是去督促呀，提意见呀，要把提案落实，主要还得靠别的单位。我们政协今年强调抓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这项工作也是我们做得比较有成效的，但这项工作我们也只能提些建议，搞搞调查研究。譬如说，湖大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也只有一个调查报告呀，还得要省委督促，湖大党委去办才能落实。我们一个问题也不能解决。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权力机关，我们是一个政治协商机关，我们只能够起到调查、了解、反映情况、建议督促，即所谓民主监督的作用。就这些工作来说，我们不是主体，是客体。但是文史资料工作却不同，这项工作我们是主体。党史资料有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搞。党史以外的资料呢？就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地由我们来征集了。因为我们不搞，别的单位不会搞，也不能搞。所以，我们说，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一项独立自主的工作。当然也需要别的单位配合。那是要求人家配合我们，为主的还是我们。政协的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文史资料工作与其他工作有所不同，它带有专业性质，在政协各项工作中一直居于一种独特的地位。你们看，别的委员会、工作组没有开过全省

性的会议，而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却开了两次。这次会议，政协的主席、副主席除了到韶山去学习的外，在家里的都来了，连穰老、凌老、卢老他们都在医院住院，今天都抱病前来参加会议，这更说明了省政协很重视这个会议。

第二，文史资料的撰稿者，主要是党外人士，由一些党外的有代表性的阅历丰富的知名人士来写，别的单位无此条件，只有政协才具备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现在全省各级政协委员人数发展到了四千四百多人，其中党外人士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可以说党外的知名人士，即湖南这近百年来，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而又有所成就的都包罗在我们政协里面，所以由我们来征集文史资料，群众基础比较扎实，比较广泛。如果再加上他们所联系的亲朋戚友，那就更多了，不是几千，而是几万，甚至几十万。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些知名人士有几个特殊的优势，一个是知识优势，我们的政协委员中，绝大多数都学有专长，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个是联系关系优势。上面讲到的，他们联系了成千上万的亲朋戚友，再一个是社会阅历优势，我们政协委员中有不少老人，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见多识广。譬如：邵阳市政协副主席陈新宪同志，大革命时期他就是我们党的县委负责人，以后虽然离开了党，在家乡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他对大革命以来湖南的情况了解最多，是一个活的历史资料库。又譬如我们省政协主席程星老，他是李大钊同志在北京领导革命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一生为革命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国革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差不多都经历了，也是一个资料宝库。我们政协里面藏龙卧虎，各种人物都有。所以，由我

们来组织写文史资料，确确实实是得天独厚。

第三，文史资料工作与政协其它工作不同。它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资料愈老，愈有价值，时间愈久愈宝贵。譬如，黄一欧先生（黄兴之子，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参加者），他在前年去世了，留下来的遗稿，就宝贵得很。所以说文史资料不仅是一时可以作用，而是长期可以作用，而且时间愈久史料价值愈高，就象买法国的白兰地，多一年就多一块钱。我们现在收集到的史料，留给我们的后代来运用，那时候的价值肯定比现在要高。省政协自从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以来，已征集到了近三千篇一千五百九十万字的史料。这是我们文史资料工作人员和广大的撰稿人辛辛苦苦搞出来的，这应是我们政协的一笔非常宝贵的财产，我们应当十分珍惜。

从以上三点来看，说文史资料工作在政协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我认为是实事求是的。

二、征集和编辑出版文史资料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有人说，搞古典文学是发思古之幽情。我们搞文史资料可说是发爱国主义之热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写文史资料就要回忆过去，我们刚才说要从戊戌变法写起，那么从戊戌变法回忆起来，从清朝末年，从北洋军阀时代，从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在国外被称为“东亚病夫”，国家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困境，人民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落到了最卑贱的地位。这对我们这些

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但是，拿过去来对比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我们的人民丰衣足食，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更是蒸蒸日上，出现了繁荣富强、团结统一的崭新局面。这两年我们湖南的变化也不小，尤其是农村。今年湖南又是个大丰收年，粮食创历史最高水平。现在老百姓愁的是没有粮仓装谷子，国家也愁着仓库不够用，我们国内形势确实是一派大好，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我们早已不是“东亚病夫”，而是屹立于亚洲东方的巨人，在国际论坛上讲起话来很有分量，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回忆过去，看看今天，爱国主义激情就会油然而生。你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把有关中国昨天、前天的这些材料写出来，不但可以鼓舞自己，而且可以教育青年后代。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中国有十亿人口，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全世界就数我们国家的人口多。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心在起作用。我曾多次提到过黄帝陵，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蒙古人来了，也保护黄帝陵，说黄帝是他们的祖宗；清朝入关，也保护黄帝陵，说黄帝是他们的祖宗；黄巢、李自成他们造反，也都保护黄帝陵，承认黄帝是他们的祖宗。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农民起义者，还是少数民族，都承认自己是黄帝的子孙，这都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的表现。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是几千年培养出来的，培养它的基础就是历史。苏武牧羊，文姬归汉，都是历史，我们就是要用这些历史来教育后代热爱祖国。所以我们说，搞文史资料是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这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提出了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口号，这个口号提得好，正当其时。提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实际上也批了“左”。过去我们对爱国还提出条件，现在就不同了。不管你赞不赞成社会主义，只要你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就是好的，就承认你是爱国的。其实，只要他承认爱祖国，而祖国现在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他一回来，一接触，看到的听到的都是社会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又确实比封建主义好，比资本主义好，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地爱社会主义。如果你硬要他首先承认爱社会主义，如果不爱社会主义我就不承认你是爱国的，就不要你，这就是“左”。有些人根本不晓得什么叫社会主义，晓得一点的，也只是吃“忆苦餐”、吃“大锅饭”的“社会主义”，这怎么能使人产生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呢？现在我们扛出爱国主义的旗帜，就能团结大多数，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

再从我们革命队伍来讲，不少的人也是由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譬如说鲁迅，他痛感中国是“东亚病夫”，就去学医，想把中国医治成“东亚壮夫”，结果在一次看电影时，看到侵略者把我们的壮夫一刀刀砍死，就感到学医不能救国，于是弃医从文，想通过文学来唤醒民众的爱国之心，最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也是从“五四”运动开始走向革命的，比如周总理、邓大姐都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培养了我们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以后的“一二·九”运动，也是一

个反对“何梅协定”，反对日本侵略者，反对蒋介石卖国的爱国学生运动，它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一二·九”运动中有一些共产党人，但绝大多数都是爱国青年，他们由爱国主义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我当时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最初只是为了爱国，后来搞来搞去，才知道抗敌救亡只能跟共产党走，这才走上革命的道路。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湖南的杨度。他想使中国富强起来，首先提倡君主立宪，后来拥护袁世凯称帝，他以为把袁世凯扶起来了，中国就可以富强。杨度和蔡锷同时在日本留学，原先他们的关系还比较亲密，一九一五年蔡锷在云南起义讨袁，提出要处以极刑的帝制祸首，第一个就是杨度。杨度在这里吃了亏，逐渐认识了错误，他想和孙中山一起搞，中山先生要他写个检讨，他不干。以后他找到了周恩来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影响下，思想上发生了一次飞跃，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是毁家为党为国，把所有的家产变卖给党作为活动经费。他是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共产党员。我们不能用“左”的观点来看问题，评价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当时许多人都不知道共产主义，各人去找自己的救国道路，一些人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就去搞君主立宪，一些人投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慢慢地才懂得，真正能够救中国的，只有共产主义。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好多都是由爱国主义走过来的。所以，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必须肃清来自“左”的影响，当然也要防止混淆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界线的右的倾向。我们搞文史资料。如果一定要是一条直路走过来的人才能写，或者把曾经走过一些弯路的人都写成一条直路走过来的，譬如杨度、程潜、唐生智，你硬要象写周

总理一样去写他们，那就不对了。他们走过一些曲折道路，关键问题，看他最后的归宿，盖棺论定。不要认为他们过去作了坏事，就把他们以后作过的好事抹煞了。反过来也不能因为他后来作了好事，有了地位，对他们过去作的坏事就都不讲了。还要注意一点：写历史要写主流，不要把一些人的生活琐事、风流韵事都写到文史资料中来，如果那样写，就冲淡了主题，所以在文史资料工作中既要肃“左”、又要防右，清除精神污染。

三、谈谈实事求是。

首先要纠正一个概念，就是一些材料上谈到要贯彻周恩来同志提出来的“存真、求实”的方针。这句话是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五年在政协四届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以后在许多文件中就简化为“存真、求实”。这样简化懂得的就好，不懂得的就弄不清楚。我看还是提周恩来同志的话“要存真，要实事求是”为好。

要存真，就是要忠于事实。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要做到实事求是很不容易，首先要坚持真理。这就有点“五不怕”的精神，要象“在齐太史简”那样，敢于秉笔直书。要做到实事求是，还要懂得历史。比如有的写假资料，你不熟悉历史，就很可能让他钻了空子。搞文史资料，要有学识，特别是历史知识，还要有胆识，即敢于坚持真理。刚才谈到搞文史资料要注意清“左”防右。清“左”就是不搞假大空；防右呢，就是不搞精神污染。这里我想谈一谈精神污染的问题，是不是精神污染，关键是看它是不是违

背了“四个坚持”，是不是反对党的领导，污蔑党的领导，是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污蔑社会主义，或者是用低级下流的东西去腐蚀人民，腐蚀青少年，这就叫精神污染。不要把什么东西都纳入精神污染，说哪个穿了件什么衣服呀，穿了条喇叭裤呀，某某爱梳妆打扮呀，这怎么叫精神污染呢。最近有人写文章说，人性就是党性，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精神污染，应该清除。但清除精神污染，要注意不要扩大化。我认为，只要你写的东西确实是与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又是实事求是的，就不存在精神污染的问题。而且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如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就把他以往怎样恨共产党，怎样怀疑共产党，怎样认为共产党讲的话有些是假的，有些是骗人的，后来共产党又是怎样把他从一个仇恨共产党，双手沾满鲜血的罪人转变成一个相信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新人的过程写出来。这样写，是实事求是的。他这样写，我们并不认为他是在骂共产党，反对党的领导。反之，这正说明了他过去的顽固性，同时说明了党的政策的威力，象他那样一个顽固的反革命，我们都把他改造教育过来了。所以只要你把一些真实的事实，不夸大，不缩小，如实地写出来就是实事求是。小平同志不是讲了吗？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你既然是实事求是，这就坚持了毛泽东思想，这又有什么精神污染呢？因此，我们写文史资料，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只要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别人是驳不倒的，也不怕别人驳，清理精神污染也是清除不到你头上来。

四、关于开创文史工作新局面的问题。

省政协文史办就如何开创新局面提出了八项具体工作。这八条，我都同意，我认为首先要突出地加快对现存文史资料的清理，积极开展整理、研究工作。在当前情况下，征集工作和整理、研究工作要并行不悖、相辅相成。通过整理、研究，使大量零散的资料去伪存真，逐步形成系统化、专题化，提高参考利用价值。

其次，要选择湖南近代现代的重大史事，深入群众，面向基层，开展专题调查，弄清历史真相。集体座谈，个别访问，查阅文献档案资料，结合进行，是专题调查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做可以避免个人回忆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且经过集体座谈讨论还可以统一认识，提高质量。这是我们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飞跃，是在实践基础上的提高。文史办打算每年搞两三个专题调查，如“马日事变”的经过，国民党制造的三次“湘北大捷”、“南昌起义”前的贺龙生平，“平江起义”前的彭德怀事迹，湖南的私立学校，等等，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题目和有意义的事情，我都同意。希望大家抓紧抓好，争取早日出成果。

其三，要大力开展文史咨询服务工作，凭借我们历年征集的史料，专业人员积累的历史知识和文史委员的丰富阅历，我们开展这一工作是有条件的。近年来，在咨询服务工作中，我们坚持做到有信必复，有问必答，上门来访的热情接待。为了搞好文史咨询工作，文史办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希望今后进一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其四，要改进《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工作，提高出版质量。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要严格把好三关，即：史料关，要做到去伪存真；政治关，要清除和防止精神污染，不

出政治性错误；文字关，要表达清楚准确。文史编辑工作是一项细而又细的工作，应该有一个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不能因为是内部发行或允许多说并存就可以草率从事。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一定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在这一方面，过去我们是有成绩的，但也还存在某些不足，很有加强和提高的必要，文史办准备在一九八四年编印文史资料时，做到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这个意见好。

第五，要抓紧培养做文史工作的接班人，要选择一两个二、三十岁的，有一定文学水平和历史知识而又爱好文史工作的同志，由老同志带着他们工作。老同志不要嫌弃他们，要爱护他们；年轻人也要谦虚，尊重老同志，要有自觉性。学习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对青年一代的成长和培育成才是一门不可缺少的主课。搞文史资料，不仅提高了自己，而且教育了人民，教育了青年一代。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绝不要忽视。

(根据录音整理，本刊有删节)



《湖南文史通讯》

《湖南文史通讯》(季刊)，一九八四年出版四期。是全省文史工作经验交流的园地。宣传文史工作的方针、政策，报道各地文史工作动态，选登优秀文史资料稿件。每期收工本费0.15元。欢迎投稿。欢迎订阅。汇款请寄长沙市迎宾路5号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收。

穰明德同志在湖南省第二次 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

一、关于爱国主义问题。

我认为搞党史与搞文史的目的都是为了积累历史资料，为进行历史研究与教学，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的。这次会议根据全国文史工作会议精神，提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口号，我完全赞成。这是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

什么是爱国？爱国不是抽象的，是有具体内涵的。爱国在目前可以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因为我们对台政策中有一条，只要拥护统一，就是爱国。但是至少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否则，又怎么算爱国呢？国家不是抽象的，我们讲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指社会主义祖国。离开这个前提，恐怕就不能叫做爱国了。列宁说：“爱国主义是人们千百年来所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杨第甫同志那天讲了黄帝陵，他去看过了，我也去看过，那的确能激发一种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我们爱祖国的古代文明，固然不错，但那毕竟是爱祖国的昨天，我们还应该爱祖国的今天。因为历史是发展的，不

能割断的。今天的中国是昨天的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因此，要爱国，就没有理由不爱今天的祖国。许多海外侨胞，他们虽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赞成统一，支援四化建设，这就是爱国。因为他们这种行动表明，他们是不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现在台湾也提出爱国，提出统一，要把中国统一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即统一到“中华民国”里面去。我们总不能爱这个“国”吧？所以，我们写文章，收集文史资料，总要有一个明确的爱国思想作指导。

我们现在教育青年，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实际上就是培养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如果一篇资料发表了，青年们看后，觉得台湾的社会制度比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好，台湾国民党好，三民主义好，而大陆不如台湾，共产党不如国民党，那这篇文章就是失败的，它的社会效果就是不好的，那就是在搞精神污染。至于大陆和台湾统一后，台湾的生活方式可由台湾人民自由选择，这一点中央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台湾人民的历史由他们自己去写好了。总之，我们撰写文史资料稿件要明确爱国的指导思想。特别是编辑人员一定要把好关，纠正一些偏颇和问题，让文史资料真正发挥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作用。

当然，对国民党我们也要一分为二，要分别不同时代，用历史的观点去看。过去由孙中山改组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期的国民党，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就是一个很好的党嘛！刘伯承元帅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他说不能笼统地讲国民党好，也不能笼统地讲国民党坏，要具体分析，对国民革命军也应该这样看。他在一次会议上讲，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国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共产党、人民政府，

从字面上看，仅有一两个字的差别，但本质和具体内涵就大不相同了。前者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终于走向了反动，根本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也就否定了它自己的光荣历史。毛主席也讲过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嘛！现在有一些人散布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和怀疑言论，这也不好，那也不行，什么都不信任，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污染现象。我们的文史资料决不能产生这种副作用，而要消除和防止这种副作用。

目前我们发动老年人士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亲见亲闻写出来，而且在党内外都提出了“抢救”的口号，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有一种光荣感、紧迫感和责任感。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去促进老年人士撰写史料，要落实到“促”字上。北京中央军委有一批老同志专门研究谁知道哪些情况，哪些事情由谁来写比较合适，他们一方面拟题找人，一方面因人出题，结果大大开辟了稿源。我们政协文史办也应该摸摸底，有组织、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征集稿件。总之，既要有一般性号召，又要有重点的组稿，争取全面地把中国近代史上百余年来，仁人志士为振兴中华的可歌可泣的奋斗业绩；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争民主的战斗历程；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运动以及许多历史人物在近代史舞台上的种种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真实地、全面地记录下来，把这些精神财富留给青年，传给后代，激发他们的爱国之情，丰富他们历史知识。这对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有重大作用的，是一项惠及子孙后代的事业，是大有可为的，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应该大显身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去我们许多实业家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如把它写

出来，不是有利于物质文明建设吗？毛主席说过只要是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学习。我们目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欧美国家的经验和技術都要学，我们自己有民族特色的经验和技術就更应该学了。这就是鲁迅讲的“拿来主义”嘛！至于建设精神文明就不必多说了。

二、关于文史资料的真实性问题。

我们撰写党史回忆录是十分强调真实性的。我认为文史资料工作也要强调一下真实性的问题。我们总是说党史和文史有共性，这就是一个共性。

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发动老年人土撰写史料时，提出了“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口号。杨第甫同志说这句话不要简略成“存真、求实”，要完整引用，避免产生歧义。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我们有些同志喜欢随意简化一些词句，有时就产生了不良影响。

所谓真实性，不言而喻，就是要符合历史事实，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写史料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以人物为中心写历史事件，一种是以事件为中心写历史人物。我举几个例子来谈真实性问题。

三国时，有个关云长，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室，过五关，斩六将，至今为人们景仰，很多地方都修了关公庙。但如果历史学家只写他这一面，而不写他走麦城的一段，那就不全面了，也就不合乎历史真实了。我记得解放初期，刘伯承元帅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省区（军）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过：“走麦城要经常讲，演戏也要演走麦城这一段。我们虽然胜利了，但不能忘记我们也曾经遭受过挫折，也失

败过。”去年在长沙召开的中南五省（区）党史资料协作会议上，肖克同志的发言题目就叫做“走麦城”。可见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很重要。（袁学之同志插话：关云长失败是搞“左”倾的结果。他破坏了统一战线，又骄傲自满。诸葛亮交给他的任务是东和孙吴、北拒曹操，这是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关羽为了家仇，为了一个弟弟的事情而把朋友当作敌人，结果失败了。所以诸葛亮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骄傲自满，死有余辜。）这也是历史教训。统一战线不能破坏。中央的政策是十六个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我们一定要牢记。明末李自成起义也是一个例子。他经过艰难曲折，团结各方人才，依靠农民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建立了大顺农民政权，这是他的历史功绩。但他后来骄傲自满，不讲政策，偏听偏信，相信牛金星，不相信李信，结果导致内部分裂，最后农民革命成果被断送了，他自己也落了个悲惨结局。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好就好在把李自成失败的沉痛教训写出来了。毛主席很推崇这篇文章，还把它作为延安整风的教材。刘伯承在重庆西南局讲走麦城时，也讲了李自成的教训。（袁学之同志插话：李自成失败在于他没有听李信的，而听了牛金星的谗言，牛金星是个野心家。刘宗敏是个武将，入城后昏昏然，把吴三桂的老婆陈圆圆占为己有，对旧军政人员搞逼供信，是个典型的军阀，我们老干部要好好研究一下刘宗敏这个人。）他还讲了一个洪秀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动摇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不愧是农民革命的壮举。但后来太平天国内部出现了“杨韦事变”，石达开又出走，结果造成了一幕悲剧。这些事情，同志们都清楚，〈血战东王